



石华鹏 著

故事背后的秘密

闽派批评新锐丛书
南帆 刘小新 主编



福建文艺出版社

故事背后的秘密

石华鹏 著

闽派批评新锐丛书
南帆 刘小新 主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故事背后的秘密/石华鹏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6. 7

(闽派批评新锐丛书/南帆, 刘小新主编)

ISBN 978-7-5550-0811-8

I. ①故… II. ①石… III. ①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50216 号

闽派批评新锐丛书为 2015 年度福建文艺发展基金资助项目

故事背后的秘密

石华鹏 著

责任编辑 任心宇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8

地 址 福州市金山橘园洲工业区台江园 6 号楼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70 千字

印 张 16.25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0-0811-8

定 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总序

◎ 南帆

“闽派批评”的称谓一度流行于 20 世纪 80 年代。当时，为数众多的闽籍批评家同时跻身于文坛，登高而呼，雄辩滔滔，许多重大命题的确立隐含了他们的思想贡献。强烈的理论兴趣无形中造就了一个醒目的群体，“闽派批评”即是对于这个群体的命名。正如人们所见到的那样，文学史上许多命名并非精心策划或者深思熟虑的产物，相当一部分美学潮流或者学术派别的命名是由于不无偶然的历史机缘，例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朦胧诗”，或者“形式主义学派”“达达主义”“耶鲁四君子”，如此等等。“闽派批评”之称并非来自学术特征的严谨概括，这个命名毋宁说源于一个简单的事实：闽籍批评家的人数明显超过了各个省份的平均数。

可以列举的闽籍批评家名单洋洋大观。一部分批评家长期身在京沪，例如谢冕、张炯、刘再复、陈骏涛、童庆炳、程正民、何镇邦、张陵、李子云、潘旭澜、朱大可等等。他们多半是年轻时外出求学，毕业之后就职于京沪的学院或者研究机构。另一部分批评家长期活跃在闽地，例如孙绍振、许怀中、刘登翰、林兴宅、王光明、俞兆平、朱水涌、杨健民、谭华孚、南帆等等。个别批评家的活动轨迹相对复杂。陈晓明当年已经在闽地崭露头角，继而求学、定居

北京；谢有顺求学于闽地，登上文坛的时候已经栖身于粤地。

如此多元的成长背景显明，闽籍批评家并未承传某种共同认可的文学观念。因此，“闽派批评”并非一个彼此师承或者同声相应的学派。从传统的现实主义、人道主义到主体论、科学主义、后现代主义，闽籍批评家活动在跨度巨大的理论场域，分别充当不同主题的领衔主角，譬如谢冕、孙绍振之于新诗论争，刘再复之于文学主体性，陈晓明之于后现代主义。

为什么闽籍批评家如此之多？如此旺盛的理论兴趣是否具有地域性的文化渊源？朱熹、李贽、严复不仅是闽籍著名的思想家，同时，他们的文学观点与哲学思想、政治理念相互呼应。闽地的历史上还出现了一些文学批评家，他们在诗论方面尤有建树，譬如严羽、魏庆之、刘克庄等等。严羽的《沧浪诗话》最负盛名，“以禅喻诗”之说在诗歌批评史上影响久远。至于辜鸿铭、林纾、林语堂、郑振铎均为文化大师，他们分别具有独到的文学理解、文学实践与文学评判。总之，历史上的闽籍思想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思想资源，以至于坊间有“闽人好论”的戏言。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无法考证，20世纪80年代集体崛起的闽籍批评家具体地受惠于哪些思想线索。他们相对一致的认识是，地域性的文化渊源无非是一个遥远的背景，“闽派批评”的浮现更多地取决于特殊的历史机遇。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解放的叙事逐渐成为主旋律。作为解放叙事的先锋，文学承担了摧枯拉朽的使命。文学批评的意义是扩大战果，开拓理论纵深。闽籍批评家接手的第一个理论战役是“朦胧诗”之争。70年代末期开始，一批风格迥异的诗人开始集结。他们的诗作充满了象征、意象和反讽，情绪忧郁、悲愤、孤寂，音调嘶哑。80年代初期，这些诗作陆续出现在刊物之上，立即引爆了激烈的争论。对于习惯颂歌与战歌的批评家来说，这些诗作古怪艰涩，主题朦胧——令人气闷的“朦胧”是当时的著名评语，也是

“朦胧诗”之称的来源。这些诗人的中坚之一舒婷居于闽地，她的诗作被视为尖锐的挑战。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诗风？《福建文学》率先发起争论。一时之间，应者云集，诸多批评家见仁见智，蔚为大观。这一场争论成为许多闽籍批评家的发轫之处。

《福建文学》策动的论争延续到1980年的“南宁诗会”，掀起了一次新的波澜。闽籍批评家谢冕、孙绍振勇敢地为“朦胧诗”辩护，张炯担任会议的组织和主持人。会议之后，谢冕在《光明日报》发表论文《在新的崛起面前》，继而又在《诗刊》刊登《失去平静之后》。如果说，谢冕的主旨是告诫人们沉住气，保持宽容，勇于接受挑战，并且历数文学史上成功的变革，那么，孙绍振力图阐发的是新诗背后的美学原则——“与其说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他的论文标题即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异于颂歌与战歌的传统，新诗追求的是“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在孙绍振看来，这种美学原则的深刻根源是人的价值标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至少在当时，这些观点惊世骇俗，以至于谢冕、孙绍振不得不承受学术之外的巨大压力。时至今日，“朦胧诗”已经得到了文学史的认可，谢冕、孙绍振的“崛起”之说酿成了新的理论话题。王光明、陈仲义等闽籍批评家之所以能够对于新诗进行卓有成效的后续研究，他们的开疆拓土功不可没。

“朦胧诗”争论之后，众多闽籍批评家共同卷入的另一个理论事件是“文学批评方法论”的论争。由于解放的叙事纵深扩展，思维方式的改变是迟早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再度走到了前面。如何解读文学？是不是仅有社会历史批评的唯一视角？各种零星的尝试和实验之后，理论的总结势在必行——“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论讨论会”于1986年的春天在厦门召开。当时，符号学、精神分析学或者接受美学等诸多西方批评学派尚未登陆，打动批评界的是以自然科学为范本的科学主义。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被奉为

时髦，不少文学研究论文以列举图表、数据与数学公式标榜科学精神。厦门会议的论辩之中，林兴宅抛出了一个大胆的命题：“诗与数学的统一”。马克思曾经认为，任何一门科学只有充分利用了数学才能达到完美的境界。诗与数学的统一显然是这种观点的美学追随。不过，过度的科学主义引起了另一些闽籍批评家的非议。在他们看来，科学方法仅仅提供各种描述真实的视角。如果无法确认文学批评力图阐述何种价值观念，批评家又怎么知道选择哪一种描述视角？因此，没有理由用貌似客观精确的科学话语覆盖人文情怀。

几乎与文学批评方法论的讨论同时，闽籍批评家刘再复提出了文学的主体性。这种观点是文学对于主体哲学的致敬。刘再复分别阐述了作为创造主体的作家、作为文学对象主体的人物形象和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和批评家。尽管现代哲学对于主体概念的种种质疑不可避免地波及文学主体性命题，但是，多数人深切地体会到隐藏于这个命题背后的苦心：构筑一个以人为思维中心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研究系统。在这个意义上，闽籍批评家的理论工作显示了一脉相承的连续性。众多闽籍批评家的知识谱系相距甚远，可是，他们不约地围绕相近的问题持续地思考，这只能解释为历史的迫切性。

“闽派批评”的出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当年，王蒙曾经对文学批评发表过一个颇具影响的观点：“闽派批评”堪与京派、海派呈三足鼎立之势。籍贯、地域文化渊源、历史机遇——“闽派批评”命名的依据显然是三种因素的相加，尽管三者的意义并不相等。然而，这个命名之所以普遍流行，显然得益于几次影响广泛的批评实践。没有批评实践的支持，种种人为的舆论吹嘘走不了多远。必须补充的一个事实是，福建省文联在20世纪80年代创办的一个理论刊物《当代文艺探索》为“闽派批评”的粉墨登场提供了重要的舞台。尽管这个刊物仅仅存在三年多的时间，但是，京、沪、闽三地众多闽籍批评家担任这个刊物的编委，刊物发表了“闽派批评”的许多重

要论文。因此，谈论“闽派批评”的组成范围，通常会提到《当代文艺探索》的主编魏世英，副主编王炳根、林建法、林焱和编辑王欣。

20世纪90年代，“闽派批评”之称逐渐淡隐。当然，这不等于闽籍批评家销声匿迹。一些批评家虽然年事已高，但是，老骥伏枥，他们仍然密切注视文坛的动向，不时发表真知灼见。更多的批评家精思不辍，开拓不已：谢冕对于诗歌一往情深，他的主要工作始终聚焦于诗歌领域；王光明、陈仲义与谢冕相近，诗歌的信徒是他们从未放弃的身份；相对地说，孙绍振的学术战线辗转不定，他曾经涉入普遍的美学问题，继而转向了微观的文学写作、经典文本分析和中学语文教育；刘再复移居海外多年，置身于另一种文化环境，沉思中国文化传统的种种重大课题。如果言及闽籍批评家转身幅度之大，刘登翰或许是一个特殊的例证。他于90年代逐渐转向了海外华文研究，不仅成绩斐然，而且形成了学术梯队，其中佼佼者如朱双一、刘小新、朱立立和袁勇麟等。90年代之后，“文化研究”的学术背景将性别研究推向前台，闽籍批评家林丹娅积极介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至于陈晓明、朱大可、谢有顺俱已卓尔成家，他们广泛涉及当代文学及当代文化的各种问题，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由于学院造就的良好学术环境，许多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闽籍批评家正在迅速地成熟……相对于闽籍批评家20多年的工作状况，这些描述无疑挂一漏万，我企图借助这些描述提出的问题是：面对如此之多的学术资源，是否到了重提“闽派批评”的时候了？

重提“闽派批评”，制造乡贤的学术聚会或者地域文化表彰仅仅是次要目的。重要的是发现新型的话语平台，召回曾经活跃的批评精神。闽籍批评家是不是可以如同当年一般犀利骁勇，积极介入各种重大的文学话题，正本清源，激浊扬清？很大程度上，这同时是

文化环境的迫切要求。

现今的文化环境之中，文学批评正在滑向边缘。娱乐新闻、明星八卦以及形形色色的游戏节目占据了大部分传媒的版面；许多人心中，网络文学几乎等同于文学的范本。与此同时，经典文学体系的声望急剧下降，“严肃”正在某些人心中演变为令人厌倦的品质。这时，文学批评何为？文学批评将在这个时代文化之中扮演什么角色？愈来愈多的批评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分量。20世纪曾经被称之为“理论的时代”。繁盛的理论生产为文学批评提供了多种考察文学、考察世界的视角。批评家可以发现各种文学话题，还可以借助文学话题阐述对于世界的各种观点。“闽派批评”的历史证明，由于批评家不懈的呐喊、辩驳、阐发和倡导，某些显赫一时的声音消失了，另一些大逆不道的观念逐渐成为共识。作为文化空间的开拓，文学批评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范畴。如果说，“闽派批评”的称谓曾经贮存了丰盛的文学记忆，那么，许多闽籍批评家即将开始面对另一个新的故事：这个称谓如何内在地织入文学的未来？

新生代批评家的加盟，即是这个故事的最新发展。唯有新生力量的持续涌现并且不断发出独特的声音，“闽派批评”才能真正重新出发，发扬光大。新生代批评家大多具有严谨的学术训练，理论视野开阔，他们代表了“闽派批评”的未来。编辑出版“闽派批评新锐丛书”，即是集中展示这些新生代批评家的实力与个性，注释“闽派批评”这个称谓的崭新内涵。

是为序。

（南帆，本名张帆，现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福建省文联主席、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出版学术著作和散文集多种，曾获鲁迅文学奖、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多项。）

目 录

上辑 谈艺录

新媒介时代呼唤新文学	(3)
写在小说边上	(8)
畅销的缘由	(19)
中国文学的十大“伪话题”	(24)
长篇小说的歧路	(32)
当前小说呼唤“文艺腔”	(38)
官场小说：风行与危机	(44)
论处女作	(48)
小说比生活精彩	(52)
质疑“X 零后作家”的提法	(56)
散文的末路与未来	(60)
文学杂志，如何“有尊严”地生存	(64)
“非虚构写作”并不能医治我们文学的病痛	(68)
诗评家们，请对号入座	(72)
诗歌对一座城市意味着什么	(77)
小说是门手艺	(81)
文坛奇闻怪事录	(84)
文学作品排行榜可以休矣	(92)

中国作家的写作野心与写作胆量	(96)
散文写作应警惕“散文腔”	(103)
从新闻到小说的路有多远	(106)
别把小说写得太像小说	(109)
话说中国文坛的“新名人”焦虑	(112)
文学批评真正要面对的是什么	(115)

中辑 批评簿

买一本书或读一本书的理由	(121)
小说之树是如何枯萎的	
——以迟子建中篇小说《别雅山谷的父子》为例	(124)
《我不是潘金莲》：一部想当然的单薄之作	(132)
争议小说《金山》有资格角逐“茅奖”吗	(139)
贾平凹《带灯》：一部没有骨头的小说	(142)
替余华《第七天》“辩护”	
——兼与郅元宝教授商榷	(150)
“堂吉诃德”在哪里	
——读毕飞宇《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兼谈回忆性文字写作的得失	
.....	(156)
一篇缺乏说服力的小说	
——读刘太白中篇小说《或许你选择了理想》	(163)
将批评进行到底	
——关于“罢看《文学报》事件”的一点说明	(167)
读余华、苏童、毕飞宇	(170)
生活的魔力与虚构的魅力	
——解读陈应松及其“神农架系列小说”	(178)
张承志小说的民族意识	(185)
没有了青春的人爱眯个午觉	
——读贾樟柯电影手记《贾想 1996—2008》	(192)
故事背后的秘密	



——读杨少衡《祝你幸福平安》	(195)
错误来自一个荒诞的梦的破灭	
——读刘玉堂《秋天的错误》	(199)

下辑 虚实间

“底层”的欢乐与尊严	
——短篇小说《小熊猫》编后记	(209)
为什么被吸引	
——《鼠疫时期的爱情》编后记	(212)
小说的氛围	
——《被诅咒的家族》编后记	(215)
寻找福建小说新实力	
——由鸿琳的小说说起	(217)
在生活停止的地方开始小说	(219)
他窥视了我们的内心	
——读余岱宗小说《幻想先生》	(221)
小说的暗示	
——《一辈子做一个窑匠》编后记	(224)
小说的盛怒与疼痛	
——《东边的风》编后记	(226)
用自己的方式讲故事	
——读杨金远新作《我要带你去一个美丽的地方》	(229)
赵月斌和《我是秃子》	(2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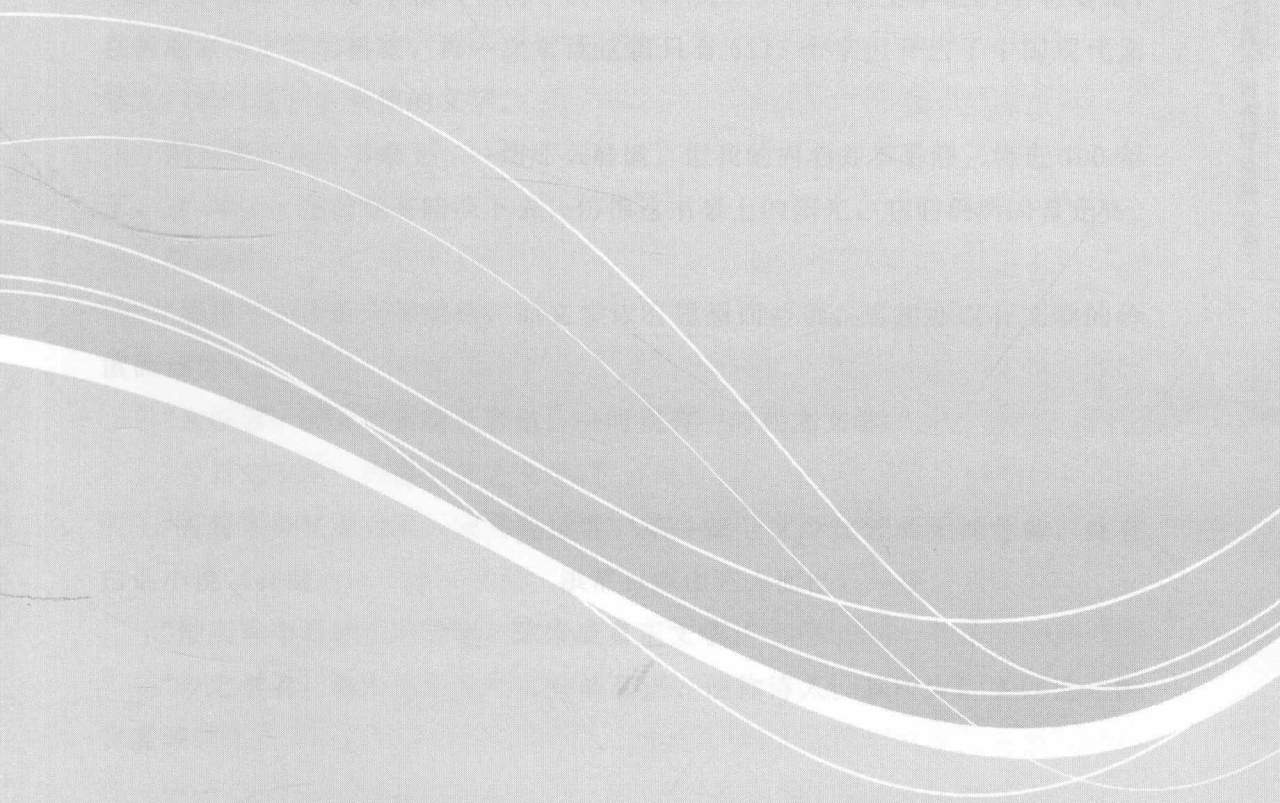
附录

讲操守的人和讲操守的批评	施晓宇 (235)
石华鹏学术简表	(241)

后记	(247)
----------	-------

新媒体时代呼唤新文学

上辑 谈艺录



新媒介时代呼唤新文学

1917年1月1日《新青年》杂志2卷5号发表了胡适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95年后，2011年底一个初冬的下午，我——一个吃文学饭的杂志编辑，在祖国东南之滨的榕城，再一次重读这篇只有6215个字但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大门的可谓石破天惊的文字。

阳光洒在我的书桌上，一切那么静谧，但我的内心并不平静。将近100年了，这6215个字并没有暗淡下去，仿佛这书桌上的阳光，它们仍然闪着光亮。

胡适说：

“思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贵也。”

“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

“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

“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炼山三人而已）一项。”

“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

“今之学者，胸中记得几个文学的套语，便称诗人。其所为诗文处处是陈言滥调。”

……

即便我们未曾读过《文学改良刍议》，但这些话我们并不陌生，在今日的报章杂志或者文学场合，类似的话总会闯入我们眼帘、飘进我们耳朵，只是说

话者已不是胡适博士，换了别的博士或者某某作家。我们发现，诸如文学与思想、文学与时代、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等话题，我们的观点与看法并没有超越胡适先生在百年前的表达，这不能不令人惊奇。

难道文学并不相信所谓的进化论，难道我们今日的文学与百年前相比并没有什么进步，难道文学只有变化？难道我们今日的文学也陷入了与百年前相似的尴尬与无奈？难道今日之时代正在呼唤与之适应的文学？要不胡适的这些话为何没有时过境迁成为“陈言滥调”呢？

或许，一个真正崭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真正释放了人的心性的时代，已经悄然来到我们身边。“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或许，这个变迁的时代正在呼唤与之对应的文学。

纵观过去的 20 世纪，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其实，我们的中国文学并没有走出鲁迅、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人的影子，他们依然耸立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大厦的顶端，傲视群雄。尽管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文学迎来了一次大爆发，但也只是一次文学观念的“拨乱反正”和一场文学知识的“恶补课”，它的内核依然延续着鲁迅、沈从文、张爱玲等现代大家开创的文学道路——纯粹的、高雅的、启蒙的、精英意识的“纯文学”，并没有走出一条创造性的革故鼎新的道路来。

虽然在那次大爆发中，我们收获了余华、莫言、刘震云、王安忆等出色作家，但如果把他们纳入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里观照，他们也只能算作 20 世纪中国文学大厦的几块砖瓦而已。我不否认，余华、莫言们的作品有口皆碑，放到世界上去也毫无愧色，只是他们依然延续着鲁迅、沈从文们的道路，并没有划破时代长空，并没有刻下属于自己的印迹，也许是时代的机遇不曾到来的缘故吧。当然，在百年的文学基业中能成为几块砖瓦，也是相当的成就了，又有多少人不过是几粒尘埃呢。

所以我以为，20 世纪的中国，它对应的文学是现代意义上的“纯文学”。这一时代的文学成就，以鲁迅、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为代表——我如此判断，并没有小觑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意思，我想说的是，这一时代，是以“纯文学”或者说“纯小说”载入史册的，以此，它足以与先秦诸子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鼎足而立，成为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符号。

20 世纪结束后，我们迈入新时代，这时代新在哪里呢？很显然，新在数

字，新在网络，即人们说的数字时代、网络时代。没错，虽然眼下我们消费着网络、分享着网络、参与着网络，但网络真正的威力和无限的魔力我们还没有真正深刻认识到，原子弹威慑着我们的身体，而网络比原子弹还厉害，它将威慑着我们的内心，未来某一天我们会感觉到害怕。

当今数字化的网络时代，它已不同于过去的20世纪以及20世纪之前的任何时代——老实说电灯的时代与蜡烛的时代不会有太大的差别，而网络的时代不一样，它与其他时代有着惊雷般的差别，想想这个时代发生的种种人事，我们发现，它打通了有限和无限、取消了现实和荒诞、混淆了虚拟与真实、看不清黑暗还是光明，甚至连善恶的道德判断和罪罚的法制底线都变得面目模糊。每一个个体在网络时代的境遇，就像一个被抛入宇宙太空的物体，是那种既自由又孤独、既沉重又轻飘、既存在又虚无、既松散又紧密的感觉。这样一个时代，人的内心将会被塑造成一个什么模样呢？或许在21世纪过去的十年中，我们已经窥见了其端倪——一个众声喧哗、人性狂欢、缄默奔波、孤独沉吟者的形象，它成为这个时代一帧模糊的剪影，我们仍难以确认自己的想象，因为这帧剪影继续在丰富中。20世纪中国是一个压抑、自我修复的时代，只有在当下的网络时代，才是真正释放、确立自我的时代。

北大教授孔庆东指出：“思想革命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然要引起文学革命。”很显然，在这样一个崭新时代，建立在人性启蒙、政治解压之上的、旧有的、精英意识的“纯文学”已经无法与这个时代适应了，文学正走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往哪里去？如何抵达？虽然有了些眉目，但迷茫依然，就如百年前胡适他们所遭遇的一样。

任何改良或者革新，都不乏探索者，但真正打破僵局、拨开迷雾者，无论是运气还是被动，只要这个事儿在他手上做成了，他必将成为历史长河中的智者。胡适之于20世纪初的文学革命的价值便在此。

“今之谈文学改良者众矣”，“然年来颇于此事再四研思”，百年前，胡适先生提出，“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我们仔细看来，改良“八事”当中，前“四事”是讲文学观念，后“四事”全是讲语言的。后“四事”中，除了“务去烂调套语”对我们今天的文学